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责任编辑：邹智贤
装帧设计：李卫平
陈巽如
版式设计：李卫平
朱永红

月是故乡明
戴文葆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 78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0921/32

印张：10.375

插页：3

字数：188000

印数：1—6000

ISBN7—5438—1684—9

I·223

定价：16.00 元

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题 记

在燥热难当的日子里，将二十来年间所写的长长短短、方方面面、拉拉杂杂的一部分拙作，按照朋友们的设计，抽出一些篇来，重新审视一过，首先涌上心来的是，处此各色泡沫泛起、令人目眩的年头，应该感谢出版界的朋友，给我一个自审反思的提示。这些年写下的风雨泥泞路上的感受，日常工作中的见闻，发自内心的独白，不就是昨日的思绪而今仍回旋于脑际么？这二十来年是难以忘怀的，理应珍惜的，在滚动中总还有一些宁静。我是怎样从纷繁混乱中相当艰难而又终于色洒如也地走过来呢？

抚心自问，不得不从“史无前例”说起，那确实是华夏史与世界史上尚无前例的劫难。打着神圣的旗帜，大革一切文化命的十字军暴乱，反映了五千年来古国阴暗的一面，暴露了历来万花筒式不断变形的精神上的痼疾。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上海召见哲学界周谷城等，曾号召应该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现在二十来岁的青春少年，恐怕已经无法想像那疯狂的岁月；脱去蓝衫的能人，也许更已忘却那举家震恐难堪的日子，自己的头脑里怎样淤积着污泥浊水了。不才万幸，诏许还乡。旧居数椽，可遮风雨；监理茅厕，赖以度日。履新当天，喜逢共和国十八周年大庆。形势大好，豪情满怀，左手高举鲜艳小红书，右手执持扫帚铁粪勺，挥舞粪勺志气昂，竟然想起东汉“少厉清节”的范滂。那时北方饥荒，官吏贪赃枉法，盗贼群起，皇朝任命他出任清诏使。赴任之日，《后汉书》说他“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我又忽而惊觉，惶恐不已，环顾茅坑四布，臭气逼人。愧蒙重用，一度掌管十座茅厕，未设副职，可以专政独断；而京都传我出身豪族，自幼娇惯，从不洒扫庭院，未便自荐，再献绵力，免于紧跟苦学，乱弹假大空的变调了。

平日蛰居闲坐，偶感寥落，惟默诵《过秦论》、《岳阳楼记》等名作以为乐，或冥想狐鬼神怪以自娱。有次想起民间传说中的白素贞来。（她可真是牛鬼蛇神，在雷峰塔下管制她的揭谛神，只算个在至高无上的大神役使下的小走狗神。）如果她安心匿伏深山大泽，倒也自在度日。她的不幸，就在于修炼成人，妄想克尽人的天职，享受人的权利，甚至要生儿育女，还开片药店来救人济世，侵犯了大名人的专利。她在雷峰塔中还悲叹不解：“在塔中，思往事，心神不定所为何情？”落得这步困境，还不知罪，不懂何以为天条所不容。当年法制不完备，缺少劳动教养。不过，天可怜见，她未读过深切了解神州万态的鲁迅的书，读了大先生的书，就不至于整天悲悲切切了。《坟·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怀着嫉妒、荼毒生灵的法海禅师，最终受到拿办，躲到螃蟹壳里出不来。“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我一次又想到圣经故事中人类始祖居住的伊甸园。上帝能造人，专为亚当、夏娃建了这座乐园，却又严禁他们采食“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俩也不知感激上帝养育之恩，偏偏受蛇来引诱，吃了禁果，违反了上帝不准认知善恶的天国里的禁锢国策。这可了不得，被逐出园外。上帝还派了天使把守进园的道路，从此不让后人重来觅得这座乐园，教他们的儿女在人世受苦。这上帝老头儿倒很风趣，我未查到材料，不知圣母玛利亚是不是不肯与他同居的老伴。他却善于玩弄世人于股掌之上，又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当救世主，到苦难的人间来卖好，据说是受命要教育好和救赎亚当与夏娃的苦命子女们。埋头劳动，闭目遐想，再加醇厚的乡情，温馨的友爱，使我尚可出处冥会，而安然穿越黑夜，迎来了新时期的晨曦。

在高耸庄严的城楼上，在红头黑字的文件中，“文革”早被宣布全面否定了。我不像美国总统里根一流高贵的人物，患了早老性痴呆症，我并未忘记彻底否定“文革”的严正决议。然而，在理智与感情的冲撞中，我谛视生活，回顾历史，感激苦难！《孟子·滕文公下》说过：“志士不忘在沟壑。”在我得以静心读书，执笔为文，或是幸会好友时，总不免要想到那无数屈死者，埋骨荒郊，无法祭扫，而我们鞋底上还沾着他们至今未干的血痕。今天幸而在滚动中获得的一些宁静，那是以他们的惨死为我们挣得的。“文革”十年，毁灭人也锻炼了幸存的人。它是一次深刻而普及的国情教育，激起了又一番浸透了血泪的新启蒙思潮。对于贫困而愚鲁的老百姓，对于经历骄人而忠顺的老干部，毫无例外地都被在后脊猛击一掌，犹如折戟沉沙，在心病沉重而丧失自信的老人心窝上无情地猛捣一拳。万恶的“文革”，通过霸道方式调教人们去小心认识古国异样的特色，意料不到地给予人们一柄可以开通七窍的钥匙。前人谈到老师培植生徒时，往往说“孔铸颜”；至今幸存的人们，应该深深感谢“文革”烈火的精炼锻打，还必须把所获的见闻与认识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远不能忘记那极左的策动，十年的惨剧。我还要引《孟子·滕文公上》的话：“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要着力启蒙，与愚昧和贫穷进行不懈的抗争，切实有效地发挥教化的力量。各种各样的笔，凭良知做点力所能及的正事，再不应成为放肆地欺哄百姓和粉饰丑恶的剧把与棍子；那些精心策划的出版物，不要化为迷魂汤与遮羞布啊！苍天在上，万目所视，如不灰飞烟灭，后世终会刨根问底，做一番严正的考据的呀！

至于《书海浮槎》文丛，原本要求多载美文。惭愧的是，风雨如晦，关山跋涉，青春子弟江湖老，早已剥蚀了抒情的彩色。由于铁板终于揭开，才能断续写下一些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徘徊体验，浅尝世态，咀嚼生活，伏案探索。不外是个人的忧喜苦乐，得失渴望，理解困惑。反躬自问，大都与书有关，或又由书及人。依其内容，酌情编次，注下年月，以便查照当日的思考与追求。在现实与历史面前低头沉思，不少问题未能展开，不免戛然而止，愧不成章。我将怎样鞭策自己、深思求索呢？

当这本小书形将面世之际，我不能忘却在“文革”的灾难中照顾与卫护我的乡亲与南北良友。他们当年的警欬与眼神，为我增添了生活的力量，激励我在冥蒙的黑夜中摸索前行。如今烟霏云散，而隆情高谊凝聚在我心中。自愧没有勃拉姆斯的才情，不用说写不出《C小调钢琴四重奏》，连陈旧粗俗的嬉游曲也不会弹奏。这里谨以拙稿中的几个标题，寄托我的感念，表示我呈献本书的微忱。

古人往往还未到我这样的年龄段，便常有“对镜”之类的诗篇，抒发虚度人生的痛楚与喟叹。因此我找出一面尘封的镜子照照自己，左看右看，看来看去，怎么都很不顺眼。难道镜子里就是我吗？怎么难道异化了的不是我呢？莫非这镜面背后水银涂抹不匀，还是镜面凹凸不平呢？我怎么这副模样，随手推开那面令我生疑的镜子。

其实，这本小书便是一面察看自己的镜子。我将怎样捐弃旧我，鼓勇去寻求新我呢？——且用不着麻烦心理医生，还靠要求自己。

戴文葆

一九九七年七月开始写于怀柔宽沟，十一月在上海写出初稿，十二月底在北京东城改成。

初老嫁女

一个雪朝，北风凛冽，德玉、正廉伉俪冒寒来访，阔别三十年，几疑天降。倒没有像唐朝诗人李益所说：“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一眼就看出故人风采如昔，不过增添了艰难岁月刻划下的许多纹痕。喜相逢中，时过心上的邓初民先生豪迈而亲切的形象，蓦地浮现于眼前。

德玉是初老的义女。初老夫妇膝下有儿有女，他俩喜欢年轻人，又接纳了几个义女。我年轻时虽在许多集会上见过他，但得亲警欸，也是他的义女晏姊引见的。30年代初，鲁迅主持左翼作家联盟时，初老是社会科学家联盟的主席。我年齿少而醒悟迟，后来读了他的政治学和社会发展史著作，便成为我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初阶。犹记那天在小什子谒见时，桌上放着他经常携带的当手提包用的白布包袱，鹤发朱颜，精神矍铄，如罗汉，如金刚，胖手给我许多温暖和力量。那出自肺腑的教言，体现着我国先进人士总是殷切地瞩望着年青一代。他的优容和关怀，至今想来，犹催人奋起。

用周总理那时的话说，初老当日是“六国封相”。听从党的安排，他是许多民主党派的诤友，同时出任民盟的负责人。最使我难忘的是，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重庆各界于“一二·九”十周年纪念日在长安寺举行沉痛而又激昂的追悼大会，三千多人出席。沈钧儒、柳亚子、郭沫若、邓初民、史良等为主祭团。沈老主祭毕，郭老慷慨悲痛地朗诵《陪都各界追悼昆明被难师生哀辞》，接着青年学生代表献祭文。致祭仪式后，初老是第二位演讲人。他用烈火一般的语言，愈说愈激昂。到会人的心都跟着一个旋律在跳动。初老最后说：“历史是无私的，反动派听着：人民的力量是不能反抗的，谁要反抗，谁就会被人民的血汗所淹没！我们今天不哭了，我们要用血汗去奋斗！”听众用持续不断的掌声应和他为大家发表的誓词。

李、闻被杀害后，反动派扬言要暗杀沈老、初老和陶行知先生。

初老于1947年1月到上海，3月间国民党军侵占延安，中共中央已主动撤出。那时白下、申江反动气焰高涨。初老等响应党的召唤，将有远行。这时，他为义女德玉主持了婚礼。所谓婚礼，不过是着我们小青年去向史良同志商借她的客厅，办两桌饭宴请友好。史大姐听说初老嫁女，欣然同意，并表示应尽屋主之谊。

那是1947年4月7日。尽管陕北、晋南和中原一带战斗方酣，上海已闻到火药味，大自然不理睬人世的苦难，春意正浓，阳光明媚，正可说是艳阳催妆。按初老指示，约请二十来客。史大姐与陆昭华先生下午早准备亲自接待。郭沫若、柳亚子、翦伯赞、夏康农诸前辈陆续来到旧极司斐尔路。戏剧界人士都知道田汉“请客”的佳话，他还有一个习惯，他被邀请赴宴时，常常拉他的好友一道来。那天果然有应云卫、唐若青与他联袂而来。初老热情欢迎后，还暗暗夸奖我们年轻人颇有先见。其他还有诗人、演员、记者、编辑和教师等等，席上并不太挤。

按旧俗说，这天是所谓三星在户双星渡。史大姐宅中，文化艺术界人士星光灿烂。绢裱的签名纸铺开时，初老请郭老领头签名留念。

郭老伏案握管，沉思五六分钟，潇洒地题诗一首：

桃李花正秾，百鸟咏春风，春申江上乐融融。鸡鸣人戒旦，但期九州早日庆攸同。

郭老大手笔，写桃李春风，既表祝贺嘉礼之忱，又言鸡鸣戒旦，警人醒睡，提示国运维艰，催人努力斗争，很得风人之旨。

初老继请柳老坐下题名，他欣然命笔：

婚姻至竟需平等，
恋爱从来重自由。
民主家庭新创造，
风云莽荡海东头。

志士仁人，时时处处悬念国家的命运。柳老点明这是一个风云莽荡的时代，上海华东也酝酿着剧变的势头了。田汉更饱含时代气息，挥毫写道：

鼙鼓满天下，
鸳鸯泛海滨。
愿成爱国志，
来慰白头人。

田汉给一对新人诚挚的勉励。在他名字的先后，还有应云卫、夏康农和唐若青署名。

我们在翦老古代史巨著里，读过他写武王伐纣，前徒倒戈，奴隶起义的生动场面；在《群众》上读过他《桃花扇底看南朝》的生动文章。二十年后，内蒙访古，也题过诗。这位史学家那天却有一首好诗尚不为人知：

亦知初老多佳女，
岂可催妆无好诗。
宜家宜室先宜国，
应把盟心代画眉。

“文革”中污蔑翦老在重庆时，每天等待反动派安车蒲轮来接，我们就看这首诗所抒发的襟怀与对青年的情意，何等高尚感人！翌日，应初老之请，翦老特用粉色虎皮宣纸将这首诗写成条幅，送给德玉伉俪。

初老本人引用《诗经》开头四句，题赠新婚夫妇。次日，又写了几行，语重心长，勸勉德玉：

凡事多留心，多研究，尤其对于你的工作和环境，这便是哲学。要懂得哲学并不全靠哲学书。哲学的目的，是教人更能干，更认识现实，落手越重。

这里还要为一位革命老妈妈写一段。德玉勤恳好学，随处留心，她就业前在四联总处银行人员训练班乙级班学习，见到女生管理员蔡亦民老师在房里看《新华日报》，看她谈吐不凡，文化素养较高，便主动和蔡老师接近。相处日久，知道她的侄女和侄女婿秘密将医药器材通过青年会运往解放区，她还有个儿子在延安。她过六十寿辰时不敢声张，深恐因

年高而被当道解职，秘密请德玉吃了一碗炸酱面。1944年8月，德玉结业、行将工作时，请她赠言留念。蔡老师以遒劲而熟练的行书写道：

德玉同学要我为她写纪念册，但是，我有什么可写呢？与其按照俗例写几句不着边际的恭维话，毋宁写几句切实的互相勉励的话，似乎比较更有意义。

希望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上，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并以这种精神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

在那艰苦严峻的时代，老一辈人对青年人多么诚恳，多么亲切！德玉后来才知道，题名“姚蔡亦民”的这位老师，是姚依林同志的母亲。德玉有幸，青年时代常得高人指教，她铭记力行不懈。

重逢不易，我与德玉、正廉欢笑谈往。那天下午诸老题诗签名后，都到户外草地摄影。我们年青人西装革履，郭老、柳老、翦老和初老等都着长衫。史大姐挽着昭华先生漫步，郭老很风趣地挽起柳老说：“我们也套个X膀子！”向晚入席，初老劝酒进菜，宾主尽欢而散。

流光容易把人抛，三十八年飞逝而去。柳老、郭老、初老先后谢世。初老享年最高，沧桑历尽九十年。他在最后的回忆中谦逊地说：“瞻仰丰碑惭后死。”他为人民解放奔走呼号，做了多少好事，栽培了多少青年！当年同席欢谈的人们，不仅田汉老、翦老等在“文革”期间被害死逼死，与我同辈的人中，如小岚、铁人等均被折磨而逝。过去有那么一阵子，帝王思想恶性泛滥，封建残渣都泛起，株连甚于瓜蔓抄。德玉因正廉而困厄坎坷，茹苦含辛，坚持工作。现在她还在做妇女工作。午餐后，我携小方送她们登车，看她步履矫健，行动迅捷，我仿佛又听到了初老宏亮的笑声。

1985年2月

像金子那样纯净的人

1950年12月间，人民出版社成立前后，承领导上三次向上海方面商调我来京工作，终蒙华东局宣传部指示我所在的单位放行。我于1951年9月上旬到了北京，最初安排住在东总布胡同忠厚里西侧的单人宿舍里。京华秋色，天高气爽，碧空如洗，播音机里飘出激昂的歌声：“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我非常兴奋地参加到吃小米的行列中来了。

那时，出版社成立还不到9个月。胡绳担任社长。我在重庆求学时就认识他。1946年他到上海主持生活书店编辑部工作，在《理论与现实》上发表过我的政治论文，又出题目教我为《读书与出版》写时事评论，并在《国际现势读本》中写了美国一章。1947年他去香港前夕，还特意把我叫到编辑部去，指点我如何学习与研究，体现了党关怀无名青年的成长。他也许早已淡忘，我至今记忆犹新。1951年9月我在人民出版社报到时，才知道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不常到东总布胡同来。

那时经常在人民出版社主持工作的是华应申和王子野。我来之前，已经读到他们编译的书籍。王子野翻译的薛格洛夫主编《西洋哲学史简编》刚出版；华应申这名字，上海初解放时，我读了《中国共产党烈士传》，就是他在山东解放区大众书店编辑的，集中反映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当时应申同志是副社长兼总

经理。

华应申同志（1911—1981年）是江苏无锡人。我的记忆中仍保存着初次晤谈的印象：面容清癯，乡音未改，质朴真挚，平易近人。他领导人民出版社的时间不长，我从没有见过他加强气势的大声疾呼。每次会议，总是不紧不慢，娓娓而谈，也善于听人发言。平日布衣布鞋，清瘦文弱，是个才不外露的人。他当日的形象，我至今不能忘怀。

在我来社工作前几个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已并入人民出版社。我曾听沈静芷同志说过，应申同志与徐雪寒同志等是新知书店的创办人。1931年春，他踏入社会不久，在上海就参加了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会。1932年春，在无锡因筹备组织文艺团体海燕文艺社而被捕，刑讯逼供之下，坚贞不屈，被判刑五年，关进南京中央军人监狱。1933年秋经设法保释出狱。1934年初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南京党组织被破坏，应申同志在失去组织联系后，自觉从事革命活动。1934年冬，在上海考进生活书店，同时参加陈翰笙、孙冶方、薛暮桥等领导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中国经济情报社的学习、研究和政治活动。雪寒同志回忆道：“我们知道他在1932年被捕过，经王昆仑同志营救出狱的。他沉默寡言，但政治态度积极，中英文都不差，还会些美术、书法，懂会计。”“1935年夏天，组织委托我和他筹办新知书店。”雪寒同志强调说：“如果没有应申，看来我是不会有信心接受这个任务的。”应申同志积极参加筹备，并被选为副经理，主持新知书店的日常业务。他是唯一的专职干部，每月拿18元生活费，住在办公室兼货栈的小房子里，还得贴回书店几元房租。一本书稿决定采用后，有关版面设计、买纸、跑印刷厂、核算成本、确定售价，以及书店设计账册、记账、开票等工作，主要都是他承担的。应申同志与出版事业的因缘缔结于此时，新知书店当时就成为上海地下党领导的革命出版机构。

我到京时，正赶上中央在新闻出版机关中开展消灭错误运动。新闻总署范长江同志于9月12日及24日，两次邀请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事业局、出版总署、人民出版社负责同志座谈，商讨如何消灭出版物中存在的错误等问题。人民出版社从8月27日到9月21日，对出版物作了一次比较详细的检查。将自编的《新华时事丛刊》、《抗美援朝小丛书》及《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丛刊》等，翻译的法律理论书籍，以及7月份出版的11种期刊，其中所有政治错误、事实错误及错字漏字的校对错误，乃至书籍广告中的错误，一一列举出来，由梁涛然同志主办一次错误展览会。我奉派协助他在大四合院前面的会议室里做陈列工作。

当时应申、子野同志都狠抓这项工作，号召全社工作人员人人都要树立严肃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与工作作风。我协助涛然同志办错误展览会，这无异保送我进编辑工作先修班学习，受益匪浅。这时，我在夜晚阅读了我社承印的几期《保卫和平》（《和平》杂志），对译文、译名、编排、校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札记。被范用同志拿给应申同志看了，他随即给我发表在1951年10月22日第41期《出版周报》上，题为《对〈保卫和平〉杂志的几点意见》（笔名魏迟）。在此之前，我还在上海工作时，于同年6月21日发表在《大公报·读书与出版》上的《介绍〈季米特洛夫文集〉》一文，其中一部分曾被转载在7月2日出版的第25期《出版周报》上，题为《〈季米特洛夫文集〉

译名太混乱》（笔名黄然），文末特加“编者按”云：“以上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社出版的其他的书，可能还有类似的错误，应即进行检查。”

应申同志长期主持革命出版机构新知书店工作，态度十分严谨，在出版发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印中共中央《解放》周刊，出版抗日救亡书刊及社会科学著译等方面，作风都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自己还翻译过M·伊林的《人类征服自然》和《苏联的发明故事》等书。曾为我国广大读者欢迎的列宁《帝国主义论（增订本）》、巴比塞的《从一个旧人看一个新世界》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都是应申同志组织出版的。对他主持“新知”的实际业务，徐雪寒同志讲过一件往事：

记得1936年春，苏联版画展览在南京、上海展出，我建议应申请人选编一集子。后来选编就绪，版子（包括彩色版）都已制好，付印前又由钱俊瑞同志（他是新知书店理事长）请史沫特莱转请鲁迅先生审阅。鲁迅先生审阅后说，编得不行，不能用。应申就决定停印，不惜资金遭受损失。应申这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作风，终身不变。（《怀念出版战线的老战友——华应申》）

尽管当时“新知”很穷，但应申同志力求内容正确充实，绝不肯马虎，绝不出版损害读者利益的书。

在我对《保卫和平》等杂志提出意见后，据我所闻，应申同志则从宏观上来考虑本社所编印、承印的各种期刊处理问题。那时本社先后出版的期刊有：《新华月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新中国妇女》、《文艺报》、《新观察》、《和平》及《保卫和平》、《翻译通报》、《时事手册》、《说说唱唱》、《抗美援朝诗·歌·画》、《中苏友好》、《人民音乐》、《人民文学》、《人民戏剧》、《中央合作通讯》、《世界知识》等。出版部因而分为图书出版部和期刊出版部。这些期刊，后来有的停刊，有的转移，有的改变出版名义，作了种种处理，以符合人民出版社的性格。早在30年代，应申同志正从事译书工作时，徐雪寒听他解说鲁迅怎样以“诸夏怀霜社”名义编印瞿秋白《海上述林》，当时就想道：“他真是一块搞编辑出版工作的好料子！”

当我初到北京时，一个星期天，他一清早就到我的住处来，问我去过故宫没有，便领我步行到天安门去。记得还有范用同志偕行。参观了千步廊和午门，又看了三大殿。当时我不过是20多岁的年轻人，应申同志是前辈和领导人。这个愉快的星期日，不仅观看了巍峨的宫阙，而且满领了领导人关怀的盛情。在抗日战争中，应申同志先后带领书店同人迁到武汉，又转到桂林，那时几乎每月都能出版新书，不但业务工作效率高，而且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能把同志们团结在一起，非常关心有理想的革命青年。此时，他也关心我的组织问题，要范用同志布置我在出版总署听党课。

华应申同志曾于1942年春到苏北解放区工作，担任盐阜区党委宣传部出版科长，兼任中共盐阜区党委机关报《盐阜报》党支部书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任苏北区党委宣传部出版科长，《苏北报》总编，华中分局宣传部出版科长，华中新华书店经理，继续从事新闻出版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新华书店副经理、党委书记。他知道苏北是我的

故乡，有时就和我谈两淮的民风，苏皖边区政府的工作，主席李一氓同志在战斗生活中如何好整以暇，以及他本人在炮火连天的鏖战中亲临淮阴城下的情况等等。在苏北时，钱毅（阿英的儿子）和后来成名的作家陈登科、陈允豪等，在他领导下工作，都说他是好老师。

1949年初，应申同志调中央宣传部，任出版委员会委员。随后担任出版总署出版局副局长、发行事业管理局局长、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副总经理兼出版部主任。而后改变新华书店体制，出版、印刷、发行三项分立，人民出版社成立，他和书店编辑部同志们到了出版社。我那时在第二编辑室，是政治书籍编辑室，还编活叶文选、台历和图解，和余崇文同志共事，他是个可以促膝谈心的人。不久，华应申被调到国际书店担任经理。

应申同志对人民出版事业和国营新华书店的建立和发展，对私营图书发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国外图书的引进和我国书籍的出口等，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显著。据我所闻，他干工作实事求是，积极而冷静。在经管发行工作时，主管领导强制要求所谓按比例发展，他分析实际情况，不能按照主观想像的比例去搞发展，沉着坚定地顶住了下达的压力。知道情况的老同志们都认为可不简单！1954年出版总署结束，并入文化部后，他先后任群众文化事业管理局副局长，计划财务司司长、办公厅主任等职。在这一时期内，发生过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等重大事件，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华应申在审查了一幅以和平为主题的宣传画后，于1961年10月便被下放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担任文化局长了。中经史无前例的“文革”，经受了烈火的锻炼。他在广西一住17年！

人的聚散因缘不可思议。领我第一次参观故宫的人，于1977年底到了故宫工作，应申同志任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临时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唐山地震后，红楼在维修，文物局搬到故宫办公。我也到故宫西北的角楼下为《文物》杂志看稿。我闻讯后，到慈宁宫去看他，感到他音容憔悴。听说他还关照出版社把我留下来工作。这时，死神已向他走来，医生宣告他已患有晚期肺癌。1980年从上海回京后，头发落尽，食欲全无。他那时一男二女都在广西，1934至1936年中断的党龄尚未恢复，他全不考虑这些，却一直关注国家的经济形势。自知已患不治之症，仍坚持读报和听广播，并留下了引人深思的遗言：

效法杨老（按：指杨东莼），

改革丧事套套。

什么向遗体告别，——

千万别搞。

死了赶紧烧掉，

骨灰不留，做肥料。

也不要到八宝山追悼，

本单位开个小型座谈，

工作检讨，生活检讨，

缺点错误也不饶，

不是光说好！

他一贯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短短几行，洋溢着他的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也透露了所处的艰难时世的严峻面目。他于1981年5月2日谢世。

青年时代就与华应申并肩创业，数十年肝胆相照、友情深厚的徐雪寒同志说得好：华应申是位“像金子那样纯净的人”！

1990年5月

月是故乡明

饮水思源，母校阜宁中学为我开启了知识宝库之门。我是1936年毕业生，那时全县只有这一所公立中学，而且还只是初级中学。

从沟墩迁到县城后，母校设在文庙里。迎门的大照壁上，嵌着砖雕的“宫墙万仞”四个字，下临半月形的泮池。穿过新建的一排教室，便是架着三座石桥的水池。后面是大成殿及其两庑，还有明伦堂、藏书楼。这完全是古代学宫建筑的规制。东边紧邻是城中小学，前清考秀才的场所。前面矗立着祈求文运高照的魁星亭。学校面前有一条小河，水流平顺，岸边树木葱翠；隔河就是公园的同乐厅和梅花岭。母校沉浸在周遭的秀丽中。

最令人难忘的还是谆谆施教的老师。国文老师特意选讲清儒张尔岐的《言志》；另一位才情横溢的老师，在地方报纸上辟一副刊，鼓励同学们写作。身患糖尿病的小代数老师，星期日上午还把我们集中到教室里当场演算。历史老师有声有色地讲说《史记》记载的垓下之战。几何、物理老师最受敬畏，他不用圆规而随手在黑板上画出圆来。音乐老师秉性率真，挥泪抚琴高唱《天伦歌》。应届毕业生那年，教导主任一歪一歪地添讲国学常识，校长来帮我们补习英语。他们无不尽心尽力，盼望家乡的子弟成才。回忆少年时，我总怀着感激的心情想起他们的风仪。

那时，我晚上常到学校里与住宿生一起温课，有时二更天才出校回家。但见魁星亭上，月华泻地，一片清幽，真叫做“月是故乡明”！

月是故乡明，人以坦诚好；国家应以培育人才为至宝！

欣逢母校建立七十周年大庆，谨祝阜宁中学作育更多更好的人才，为祖国实现全面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1993年8月

患难中和恹逸群守岁

那还是1967年初秋，“诏许还家老贫贱”，我只身离开混乱动荡的京都，云山万里，赤手南归江苏故里。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凄怆中依然涌出几丝欣慰。住下才两天，在阜宁中学高中部刚毕业的大外甥女对我说，学校图书馆有个姓恹的管理员，听说过去是大干部，新闻界的老前辈。她问道：“想必你一定认识的吧？”我顿时发了怔，不禁长长地“啊”了一声，又惊又喜。喜的是终于知道了斯人的下落，惊的是“人生何处不相逢”，竟在此时此地邂逅！

我的思绪回到1953年。当时在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工作，某日上午，我在南楼下西侧小卖部购物，听到身边一个南方口音的人买纸烟，转头一看，此人身着灰色西服，他也看了我一眼。啊！原来是听说调到

这里新华辞书社的恽老。他在沪上的遭遇早已披露于报端了，我们都没有多说几句话。后来他到城外杜家楼去了，担任地图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一天，黄洛峰同志打电话到我们出版社总编室，范用同志转告我，说老恽在这儿生活上有些困难。一贯关心知识界和作家们的黄老板，要我们设法酌予帮助。当时正值提倡重印有价值的旧书，我就着人誊抄他在解放区出版的很受重视的《蒋党真相》，其中关于宋子文理财术一节，可说是民国财政史的科学论文，评述入骨。我又请出版总署审读处负责人细看一过，提出一些意见，附上约稿的二百元定金，请恽老阅改后还我付排。清样刚看好，不料中宣部出版处闻讯查询，为什么这时要出他的书？我心知必有大事，立即主动承担责任，检讨错误。所幸那时领导尚通情达理，指着我说：“他不知道。”恽老的书改为“内部发行”，仍署“翊勋”笔名。这是1954年年底的事。

1955年初，恽老刚奉调筹备成立古籍出版社不久，红五月的一个下午，在院子里遇见《世界知识》杂志的吴景崧编审（他在“文革”中服多种安眠药而去了），他告诉我：“老恽昨天下午被抓去了！”吴景老看我十分吃惊，又补了一句：“是为从前的事，与今日无关！”我从没有在恽老直接领导下工作过，我晚生，未赶上他活跃在报坛和地下工作中的日子。他是我的老师和许多前辈的好友。年轻时即从前辈们的谈论中听到关于他执笔为文、倚马可待的风采，又读过他的一些旧作，心仪其人，从这一年起，刚出版一个月的《蒋党真相》及其作者，一并尘封了！

阜城是我父母之邦，我回乡不久终于在清洁管理所获得了清洁工的劳动岗位。我坦然地扛着粪勺，拎了水桶，上任打扫厕所之日，正逢伟大祖国建立十九周年的大喜日子。区区不才，深蒙桑梓照顾，只打扫两个厕所，20分钟即可了事，月工资12元。家乡一名壮劳力，在农村苦干一年，年终结算，也得不到144元。予何人也？何其幸运，又深感惭愧！平日闲暇尚多，随便抓一本什么书，就把我引领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这时周围邻舍的小友，有几位正是阜宁中学的学生，承他们不厌弃，常来看我，谈论当地的新闻，“文革”引起的骚乱，最喜欢谈到的是恽老。从他们口中得知，恽老被分配到该校就业不到两年，他在学校图书馆中辛勤分类登录、做卡插架的图书，就被打翻在地，践踏撕毁；按月整理、装订成册的报纸被强行拉走，很可能给杂货店当包装纸用了。他搬出与一位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教员同住，早晚打扫校内十几座厕所，清扫往来道路，汇报思想情况，接待外调人员，由专案组监督管制；加上打饭打水，料理个人生活琐事，日无宁时。

和我接近的几位阜中同学，大都是老邻居家的后生，渐渐无话不谈，常将恽老情况相告，称他为“活辞典”、“资料室”，都爱听他谈论，言谈中流露着对他的尊重和敬佩。在一次批斗会上，有学生竟问他认不认识我，于是，他凄然地得知我也“打回老家”来了。我问这些同学，既然十分钦佩恽老，为何又常开会批斗他？原来，年轻人好奇心特强，抓到这部活辞典，就常常要翻检看看，提问题让他讲往事。恽老也坦荡荡，问到什么，就侃侃而谈。学生们闻所未闻，越听越有味，满足了便“且听下回分解”。这时大致还是所谓文斗，学生们“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当时待罪故里，闭门思过，“妾身未明”。除去劳动，极少上街

走动。然而这个县城太小，我终于见到恽老了：一次我在南水关桥下汲水，他从桥上走过，学校就在桥东不远处。这次他没有看到我，我也没有怎么看清他。另一次在大街上，他显然是去邮局，我来不及闪在一边，只好向他行了注目礼，就相背而去。这次见他面容清瘦，穿上破旧的大棉袄，戴上三片瓦的棉帽子，踽踽独行，相当虚弱。后来我便向和我相熟的这些同学建议，得便做些解说，老人承受不起成天在紧张中生活，可否少开乃至不开这种谈往的批斗会；不妨三五人找他围坐而谈。反正快到残年岁底，社会上派别对峙的劲头一时冷冻起来，学生们对批斗会也觉得厌倦了。

春节即将来临的时节，常来的小同学告诉我，校园里冷冷清清，只有“活辞典”还在干脏活。一个孤独的影子立即在我眼前晃荡。能不能稍尽地主之谊，邀约老前辈来守岁呢？我毕竟还有相对自由，于是，在探听了阜中校园道路后，便在年三十下午2时左右，走进了别离32年的母校，来到他的住处。相见之下，悲喜交集。我立即长话短说：如认为尚无危害，请今晚来我寄寓一同守岁。并约定，我5时站在三角布店前空地恭候，见到后，我当即转身前行引路，概不交谈。说完便告辞了。离校时未遇见一人。出校门后，我不禁雀跃，额手称庆。

向晚，市街行人已少，我伫立街头，见他蹒跚而来，正点到达。远远对视后，我转身遥领，引他到我蜗居坐下。他解开棉袄，喘息方定，就随手抓起桌上“前门”，擦火抽烟。平日我房中无灯，是节省开销之意。今日特从过道里拉来电灯，过节守岁祈福嘛。在昏黄的灯光下，蓦地记起老杜的诗句：“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到处骚乱不宁，难得的小聚啊！

1966年后，不能自食其力，我真的成为“剥削阶级分子”。所幸尚有旧宅数椽，足可栖身，开门七件，仰仗胞妹关照和几位新知接济。除夕特备酒菜香烟，没有客套和寒暄，首先衔杯问谪居。他不能饮“洋河”，斟上红葡萄酒，呷了一口便说：现在生活比囚居中好多了，那时独居一室，门上留有钢窗，倚门只见蓝天一方。除去不时走来张望的士兵，十年中未见过几个人。定时拿饭来，两菜一汤；也看到提着四只饭格的，想必是给高级犯人的。起初估计潘汉年就关在不远的地方。有不少人耐不住长期禁锢的孤独生活，无人交谈，不许走动，日久不能克制烦恼闷郁，便不幸发疯了。他又呷一大口酒，接着强调他自己能自制自慰，问心无愧，无事不可对党言。面壁十年，尽力适应这种刻板冷冻的活埋式生活，死寂中自求思想开展，活动四肢，不甘被默默地折磨而死。说到这里，焦黄的面庞稍现红晕，语音浓重，两眼生光，眉宇间现刚强不屈之气。

我请他边吃边谈，慢端杯，多夹菜。我在困穷中，当时只准备了“四样头”，这是我们江北人待客的家常小酌。想到他历尽苦难，年高体弱，齿牙动摇，舍妹做的几样都是长者吃得着的菜肴。我看到他已缺了几颗牙，这可算是大树的年轮吧。

他知道许多人关心他的冤狱，继续围绕着这一问题谈。他说他的遭遇，非三言五句所可尽述，因潘案牵连入狱，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但他绝不妄自菲薄，个人缺点招怨，原则立场毫不摇动。平生以“不为物移，不为己忧”自律。到阜宁中学后，整理图书，做卡登记，工笔缮写

三大本。借出翻破了书籍，一一修补后出借。收拾紊乱的藏书，搬动插架，贴补装订，所耗劳力，为生平前所未有。何况年齿日增，劳役超过壮年负荷，仍怡然从事，日常绝少休闲。随身除生活日用品外，别无长物。幽居面壁，虽在人世而绝少见人，并没有抑郁颓丧，发狂而逝。现在有工作可做，又能看到接触到外部世界，更可很好地接受人生难遇的检验了。他说到这里，定神地看着我。恽老为我展示困厄中做人处世的准则，言教身教，显然激励我坚毅持重，迎接苦难。

火接火，在香烟缭绕中，他说，相信周恩来总理会为他甄别平反。1968年，应该是为他恢复公民权的一年。他的想望，当是基于1965年最高人民法院秘密审判的决定。我默默听着，不敢想“应该是”与“实际是”中间有多大的断裂。世乱纷纷，世变日亟，周公又将殊难自保。在北京饭店逮潘后，陈毅市长本有边工作边审查的建言，亦以公缄口而未果。我举杯掩遮怅惘情怀，无言以对。

若干年来，新闻界公认恽老学识渊博，剖事深切。这也不是先验的，是好学不倦，读书、阅历、思考、穷理的结果。他夹点菜，要我说说北都情况，又问办公室里他的一部《清史稿》还存着么？我说，秦火熄灭后，典籍不是又出现了吗？这类书将来会重印，文化是消灭不了的！

他知道我不能经常阅读“两报一刊”，觉得并不怎么可憾，不过由此失去了在相异观点立场中锻炼和考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未免是个缺陷。他认为应该读一些新进士的策论和五言八韵的试帖诗式的作品，可以益智，可以观照真假马克思主义。他指出，夹带黑体字的流行新文体，正是从晚清到“五四”时先进知识界所鄙弃的腐臭的文体，是老八股借尸还魂的新八股。他为之扼腕叹息，我感到这是新闻界言论界众多的端人正士的悲叹。他还说，林彪序小红书何言之谀也！学生们问他，历史上奸臣弄权，残害忠良，用什么手段来摆布极峰，欺压举国呢？又何以在历史上，在现代史上仍然层见迭出呢？他怎能正面回答。于是他谈到造神运动和个人崇拜的闹剧和灾难。今天回忆曩昔所谈，大约就是后来他写的《论新八股》和《平凡的道理》的最初腹稿。

小聚时间不觉长，街巷里祝福的爆竹响了，人家在团聚守岁呢。他说到1966年6月曾赴滇与家人一聚。其夫人刘寒枫内侄惕成，系我同窗好友，曾告以恽老子女各一，女为其妻妹所生，子为其弟产。恽老1949年前尽瘁国事，与家人离多会少。夫人一生在艰危与悬念中度日，抚养子女成立。子女在受株连中奉母惟谨，念父不辍。

海隅苦寒，我看他棉袄里钉有马蹄袖似的护袖，问他衣着缝制洗涤上有何困难，可以着人前去相帮。他说生活上锻炼得尚能自理，只是体力已受摧残，入冬哮喘颇苦。久经磨练，耐得住岁寒。我担心，最恶劣的局面还未到来呢。

夜深沉，外间鞭炮声连续。我准备了三包“飞马”，两盒火柴，请一位小友稍稍保持距离，伴送他过南水关桥返校；再三叮嘱，不宜与外间多作书信往还，议论时事。来日不可知，恐难再聚，相互珍重，以策安全。我目送他慢慢向东走去，在黑夜朔风中消失。

1968年盛夏，闹腾得更猛了。夏夜大街灯火通明，七里长街摆战场，恽老照例陪同学“走资派”长跪听训；或在白天挂牌示众，劳役加增。这以后我与恽老曾有十分短暂的接触，只递给他随身带的香烟之类。尽

管当时众所周知“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城市里香烟、火柴也很难买啊！他在阜宁还有一些我所得知的琐事，不能尽述。

1978年暮春，恽老到京访友，受到周静、计惜英、胡愈之、陈野苹、黎澍、徐雪寒、张明养等热忱接待。热情刚直的史学家黎澍为他接洽了南京第二档案馆的工作，中央组织部出了介绍信。他到南京后，黎澍很惦记，是年冬又特着《历史研究》与地震资料研究编辑部门人事负责人吴君承毅，由沪过宁时前去拜访，了解安置情况，并承第二档案馆惠允关照。承毅回京后告诉我，临别时恽老还询问我落实政策情况，闻言感念。可是，不到十天，恽老就离开他拳拳眷念的多难的祖国而去了。

与恽老在地图出版社共事不久的曾世英，就是与丁文江共同绘制申报馆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集》的老专家，1981年底与我在车上幸会，曾老立即询问恽老状况。我回去将恽老针砭时弊的大作复印寄上。1982年1月13日得回示云：

无意幸遇，一大快事。承复印纪念旧友文章，谢谢！

逸老说，“五十年来之积习难改，每见利害涉及人民之事，终必白之于当道而后安。”读之如见其人，值得大家学习。

1980年，恽老26年冤案得以平反昭雪，1982年恢复党籍。板荡识英杰，何需素车白马，鲜花山积，他有文章和事迹在，已经与中国现代史相融合，相印证：他曾为人民共和国奠基的长过程运石搬砖。

1994年2月

我的老师张明养教授

我的老师张明养（1906—1991年），是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政治学教授。可是，人们可能不知道，他还是一位辛勤的编辑家。从30年代初在《东方杂志》供职起，到1958年还主持过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工作。在他所从事的社会工作中，编辑一职几乎占三十年之久。通过编辑工作，他把自己造就成专家学者；作为专家学者，又充实和提高了所负责的编辑工作。

张明养1906年生于浙江省宁海县，本名良辅。1929年夏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系。那时他没有急于找工作，却到震旦学院去专修法语。1930年初，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参加《东方杂志》和《学生杂志》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在此稍前，1929年12月10日出版的《东方杂志》“新语林”栏，就已发表了署名“良辅”的文章。

我国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不少前辈曾在商务编译所工作过。张明养说，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所适于培养人才的社会大学，那里有藏书丰富的东方图书馆，有学有专长的各种专家可奉作良师益友，还有更多的写作实践和接触社会新思潮的机会。”他进馆不久，就结识了原在商务工作，刚从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回国的胡愈之。他在悼念胡愈之的文中说：“愈老为人和蔼，平易近人，对我这个编辑部中最年轻的编辑，多方予以鼓励、培育和使用。”“1932年‘一二·八’事件中，商务印书馆被日本侵略者炮毁，《东方杂志》停刊，于半年后重新恢复时，胡愈之承包编辑《东方杂志》，亲自筹备复刊，

担任主编。这时原《东方杂志》的编辑，很多去参加了申报馆出版的《申报月刊》工作。因此他主编《东方杂志》复刊时，仅有我一人回去工作，另外又新聘了二三位编辑。他除承包《东方》外，还兼任一个外国通讯社的编译工作，并帮助邹韬奋先生办好《生活周刊》和创办生活书店，工作很忙，因此对于《东方杂志》编辑工作，除了编辑方针、主要选题和重要稿件由他亲自决定审阅外，其余一般具体业务和行政事务，几乎全部都交给我及其他同事负责处理。他对年轻人的充分信任、大胆使用和关心爱护的情景，我至今深记不忘。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不仅在编辑业务上学到许多东西，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更得到他热诚帮助，获得很大收获。”张明养就是这样在胡愈之领导下从编辑工作中锻炼成长起来的。

1934年初秋，胡愈之为生活书店筹划创办《世界知识》时，最初就在张明养的住处集议。那时他新租了旧法租界吕班路万宜坊寓所，家具还未摆设，胡愈老、郑森禹等和他坐在楼板上计议着。他虽因为订有合约，未能辞掉商务的原来工作去做专职编辑，但他从此一直担任《世界知识》编委，几乎每期都用“张弼”等笔名撰写专文。胡愈老的二弟胡仲持主持《申报》言论时，张明养还经常为该报撰写社论。1936年底，上海救国会七君子被捕，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被封，书店出版了以谢六逸教授名义主编的《国民周刊》，实际主持编辑工作的则是张明养。抗战全面展开后，随《东方杂志》迁到香港，尽管又主编《学生杂志》，还参加胡愈老创设的国际新闻供应社（即著名的“国新社”）工作，编发有关宣传抗战的稿件。1941年4月，党领导的《华商报》在港创刊，他被夏衍等聘为编委，负责撰写专论。所有这些工作，他都默默认真地进行着。

关于明养老师在30年代和抗战时期在香港情况，夏衍同志特予介绍道：“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张明养同志由中共南方局的安排，在香港开辟对外宣传阵地。他和邹韬奋、范长江、乔冠华一起，在廖承志同志的领导下，筹备和创刊了《华商报》，他是社务委员会成员，并撰写社论和时事述评文章，同时还协助韬奋同志创办《大众生活》，也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胡愈之主持的《世界知识》等刊物上写了大量文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我曾在他家里避过难。”

夏衍还说：“抗战时期我党领导的对外宣传通讯社‘国新社’香港分社，他也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又强调说：“特别要提到的是早在1934年，在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他就是胡愈之创办的《世界知识》的编辑和撰稿人。1935年冬《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他签了名；同时他还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这些活动都是党直接领导的。”

他担任《东方杂志》编辑职务的时间很长，从1930年第二十七卷起，而后“八·一三”上海抗战发生，《东方杂志》一度迁至长沙，1938年8月间又迁香港，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港九沦陷，该杂志出到第三十八卷告终，他此后才脱离商务印书馆，由党派人帮助离港到达桂林。

1942年，张明养经张志让老师约请，到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法学院政治系任教。我先后选读了他讲授的《西洋政治史》、《西洋外交史》和

《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政府》一课，阐明其原委、流变、权力中心所在，组织制度改动，条分缕析，是开创性的研究。二十年后，我参与编辑《蒋介石演说集》时，对蒋在国民政府的职务变化，组织法的改易，了解清楚，全得益于听明养师讲授。我当堂静听，详细速记，课后又加以整理，至今我还未见到同类书籍中有哪一种能达到先师的水平。可憾的是，我的笔记本在动乱生活中丢失了。那时，他仍然没有离开编辑工作，到夏坝后即被法学院院长张志让聘为著名的国际时事翻译杂志《文摘》的编委。抗战胜利后，他继续在上海江湾复旦大学任教，经常还为《新中华》杂志选译国际论文，给《世界知识》写稿。1948年底，叶圣陶、傅彬然离沪赴解放区，他兼任《中学生》杂志主编。这时他还积极参加以张志让为主干的上海大学教授联合会的革命活动。

1949年建国后，担任复旦大学政治系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学生》一度改名《进步青年》，他在沪仍然担任主编工作。整个编辑部只有一位女青年欧阳文彬负责日常编务，16开本，用新五号和六号字排，杂志正文每期54页，在执教中挤出时间，担负着多么繁重的组稿审读和整理编校工作啊！

1952年间，由于胡愈老的邀约，他从上海复旦大学被调到北京来主持《世界知识》编辑工作，而后又兼任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当时《世界知识》是周刊，年年还编辑出版《世界知识手册》。他待人诚挚，工作耐心，从无疾言厉色，但又坚持原则，领导和团结同人，保证刊物质量，谨慎而又从容地准确完成编辑出版任务。

1957年秋，他被调到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担任领导职务，开展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同时主编《国际问题研究》。1958年整风时，又回世界知识出版社代理总编辑职务，他真和编辑工作有缘！在那“大跃进”运动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发展起来，不少错误的口号流行着，社内也有人跟着乱嚷嚷，编辑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他冷静而细心地带领同志们沉着地工作着，平安渡过风紧浪涌。一年后，回到研究所，仍然经常关心编辑工作。此后，他一直同时挂着全国政协常委名义，并参与民主促进会中央的领导工作。

他很关心帮助提携年轻人，不论是做编辑或是当教授时都如此。在大学教书时，他和张志让、周谷城老师，都为我们学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下创办的《中国学生导报》写稿。有一次他在学生办的墙报上看到一个三年级学生写的论文，便把这个学生找来，教他誊写一份，后来发表在1944年2月29日出版的第四十卷第四号《东方杂志》上，题为《当前世界政治的主流》。这个三年级学生就是我。同年11月30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上，又刊载了我的一篇论文，也是经他介绍发表的。我在大学毕业不久，《世界知识》在上海复刊，以及生活书店出版的《理论与现实》、《国际现势读本》，都发表过我写的论文。后来在上海《大公报》编报，经常受金仲华先生教导为《世界知识》写稿，起始也是明养老师介绍的，至今犹记1987年9月9日，第一届韬奋出版奖在政协会堂颁奖，我代表全体获奖者致词后，走下讲台，意外地看到明养老师坐在右侧前二排，我立即驻足敬礼。他是多么关心我国出版事业啊！还和30年代关心支持生活书店、开明书店等一样的情怀。

明养老师生平，将专家、教授、编辑融合于一身，关心祖国命运，